

近五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

张 丽 任灵兰

有关“中国海洋史”的记载和论述虽然可以上溯至久远的年代,但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3年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拉开了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序幕。而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出了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开始,中国的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近年来,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率先呼吁国内史学界关注海洋问题,并从1998年开始先后主编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从中可以窥见这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的探索和进步。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强化了海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宽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

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所,与其先后成立的浙江海洋学院、湛江海洋大学以及厦门大学海洋研究院等,标志着我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阵容已基本形成,学科发展初具规模。他们开展的海洋史研究的领域相对比较广泛,囊括了从海洋的历史地理、考古、军事、科技、交通到海洋文化的概念、内涵、特征、功能,从海洋文化建设到渔文化、盐文化、海洋意识、海洋文学艺术、海洋知识教育、海洋旅游、海洋民俗文化、海洋人文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其中,中国台湾的海洋文化研究也曾一度形成高潮。而之后于2007年成立的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更为重视海洋史的研究,“中国及世界大国海洋战略研究”和“中国东海、南海研究”是其重点研究课题,而其中的历史研究占有重要位置。2009年7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立足历史,面向现实,在区域史、海洋与世界前沿视野下开展海洋史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并将定期出版《海洋史研究》辑刊,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海洋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这些研究机构近年来已经培养出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进一步壮大了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队伍。

最近五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出版了一批海洋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专著、文集及丛书。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①、《中国海洋文化研究》6卷文集^②、《海洋文化与社会》两部丛书^③、《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④、《海洋与社会:海洋社会学初探》(海洋环境与社会研究文库之一)^⑤、《大国崛起》(丛书)等。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会

① 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

②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编辑:《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6卷,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4—5卷,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海洋文化与社会》系列丛书已于2008年和2009年出版两种。

④ 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崔凤:《海洋与社会:海洋社会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议论文集,例如《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①。2010年6月8日,在主题为“我们的海洋:机遇与挑战”第二届世界海洋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主题为“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海洋与海洋时代”一组文章,将海洋史的研究推向高潮。总之,近五年来海洋历史文化研究可以说成绩斐然。

另外,2006年至2010年,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召开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达十次之多。例如,2006年8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东北亚海上交流历史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香山文化与海洋——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于2007年9月在广东中山市召开;2007年10月,福建省首届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2007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建设弘扬海洋文化研讨会”^②;2009年11月,海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等等。总体上讲,近五年来我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海洋文化

我国的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在传承和保护的同时理应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学界近几年来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海洋与沿海地区文化的形成及特点上。

陶思炎认为,我国现在正迎来亲近海洋、开发海洋的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想到海洋经济的发展,尤其要特别关注我们悠远丰厚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建设作为海洋经济区发展的有机部分和先导,并作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坚实基础。我国的海洋文化发展战略不仅要在各沿海经济区内有所体现,而且应有上下呼应、左右联动的机制,把分散的地方优势文化资源整合成推动国家发展的软实力。^③

李隆华指出,海洋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洋文化将引导和鼓舞我们的民族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使我们的海洋实践提升到文化自觉的水准,并使我们的民族文化重新振奋起来。^④

韩兴勇、郭飞认为,在发展海洋经济的时代,让国民重视海洋,认识到发展海洋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而为培养国民的海洋意识,努力提倡和发展海洋文化及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举措。^⑤

薛三让认为,海洋孕育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被称为人类可开发利用的第六大洲,是人类文化原创与发展的永久领地和源泉。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且终成格局,预示了一个和谐发展的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⑥

王赛时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人开始冲破陆地文明的方位束缚,启动更为广阔的海洋视野,面对海洋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涉海奋斗,积累并传递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文化,海洋因素强力渗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海的冲击,看到

① 国家海洋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编:《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求是》杂志2008年第5期。

③ 陶思炎:《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

④ 李隆华:《论海洋文化及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意义》,《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⑤ 韩兴勇、郭飞:《发展海洋文化与培养国民海洋意识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6期。

⑥ 薛三让:《重塑海洋文化自信的战略考量》,《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了海的未来。^①

林有能等指出,地处珠江入海口的香山,包括了中山、珠海、澳门三地,香山文化一脉传承使三地在文化上共同繁衍。得地缘优势,香山人在获得渔盐之利的同时学会了围海造田和中外贸易,形成了海洋经济与农耕经济、商贸经济并重的经济社会格局,实现了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商业文化的转变。^②

黄新宪指出,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逐步形成了独有的特质,即自觉的海权意识、开放的胸襟、冒险拼搏的精神、多元性与兼容性,以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海洋文化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以福州船政局为主体实行的早期留欧教育上。二者的密切结合在海洋文化史和留学教育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③

司徒尚纪在诠释海洋文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南海海洋文化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从先秦到当代南海海洋文化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南海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文化和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是南海海洋文化的特质和风格。^④

王颖、郑松辉、戴光中、赵利平、覃如冰等人也从海洋与本地海洋文化形成的角度来论述当地的海洋文化特征,基本上都认为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孕育了各地的海洋文化,其共同点在于:强烈的开拓精神、浓厚的商业气息、开放的思想意识等,同时各地又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浓郁的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⑤

金曲良认为,中国作为海陆文化同构的泱泱大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基础缘自远古形成的沿海人文地理的区域格局,广泛分布的贝丘文化遗址的存在,众多渔盐舟楫遗物的发现,夏商周以降沿海疆域统辖管理的格局。各“海王之国”的海洋发展及其与海外世界交通交流网络的形成,都为秦汉以来中国统一的陆海疆域架构、统一的陆海文化模式、统一的海内外华夷宗藩体制和“汉文化圈”的发展、繁盛奠定了悠久而深厚的基础。中国海洋文化包括海外交通交流的历史遗产,即基源于此。^⑥

杨国桢指出,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是以陆地为本位、用欧洲中心论建构起来的。古代世界史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及其内部的互相交往、碰撞或冲突,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近代世界史则是工业世界征服农、牧世界的过程。人们承认大海影响了世界文明,那是因为海洋成为各个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促进了大陆文明的一体化。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后,海洋究竟只是大陆文明间交往的一条通道,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是否只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海洋世界。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海上文明早已有了洲际的传播。海洋作为不同陆地文明跨界交流的道路,是各种海上文明先行接触和互动的结果。如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海洋世界

① 王赛时:《海洋探索与唐宋社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 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黄新宪:《福建海洋文化特质对早期留欧教育的影响》,《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④ 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王颖:《山东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郑松辉:《论潮汕近代民居建筑的海洋文化内涵》,《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戴光中:《宁波帮与海洋文化》,《宁波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赵利平:《论舟山海洋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覃如冰:《百越海洋文化特征初探》,《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金曲良:《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作为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来对待。

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史论述是西方发达海洋国家推行海权扩张的产物。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

海洋史学在于考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与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庆新发表文章探讨了海洋考古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海洋考古是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以前称水下考古、沉船考古。其研究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考察对象是历史时期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文化遗存,包括沉入海洋的船只、器物、城市、港口、生产和生活遗址,以及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海底墓葬,乃至濒海地区人们从事海洋活动相关的宗教遗迹、信仰系统,等等。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投入,特别是东南海域沉船考古的不断进展,也使南中国海区域海洋考古成为焦点。^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于2009年3月立项,将“南海1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常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

海洋管理、政策及对外关系

近五年来,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海洋管理体制、对外政策、海上贸易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

杨国桢认为:“各大洲陆地文明吸纳海洋文明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命运。大航海成就了伊比利亚扩张,而葡萄牙、西班牙先后衰落是因为陆地上的领土野心消耗了海洋势力。荷兰、英国的胜出,关键在于放弃了传统的领土观念而争夺海洋,海岸和商港成为帝国的边界,归根溯源是海洋观念的转换和创新。亚洲、非洲、美洲古文明的近代衰落,在于忽视海洋、失去海洋,最终也失去了陆地。”^②

李文睿认为,当代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海洋权益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的海洋经济管理。^③易泽阳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的诞生、发展和影响,还对明朝的沿海卫所、墩、巡检司、水寨等作了考证。明朝中期因为重视海岸防御的整体防御和军事海防思想和战术,因此,重新夺回了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并缓解了明代的海防危机。同时,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还为清代、近代以及今天加强海防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④

陈春生也就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论述,他通过对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了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适应过程。^⑤

① 李庆新:《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② 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

③ 李文睿:《当代海洋管理与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易泽阳:《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⑤ 陈春生:《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下),《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3期。

郭渊认为,在西方列强对我国南部海洋国土的侵略中,英国走在前面。英舰船勘测的范围广,遍及中沙、西沙、南沙和东沙群岛。他们非法勘测的次数也最多,达到近30次。日本自20世纪初就不断染指南海诸岛,企图掠夺那里的磷矿资源。德国自18世纪中叶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后,就不断地对处于南海航线的西沙、南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法国对我国西沙群岛也心存野心。^①

陈国栋认为,以清代前期为重心,并追溯上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一直处于发展的态势。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在鸦片战争前越来越走向式微,终致后来沦落为任欧洲列强宰割的鱼肉。^②

黄秀荣认为,海盗活动的高涨是16世纪中英两国历史的一个共同特征。其相似之处为,中英海盗群体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破产农民,也都是一些失势的封建贵族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而充当领导角色的则是海盗商人。差异则主要表现在,英国海盗群体有以英国女王为首的王室、政府官员的参与,使得英国的海盗群体具有半官方的性质;而在中国海盗群体中,则只有很少的低级边卫官员参与。他们都具有凶残与仁慈的两面性,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主观上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及共同的商人特征,等等。16世纪中、英海盗群体性格的异同造成了自身命运的差异和对两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同,这也是中英两国发展差异的因素之一。^③

庄国土认为,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④

陈晓望指出,由于明代的特殊环境和福建商人的活力,造成了福建商人在海洋贸易方面的特权,因而控制了浙江与广东海域的海上贸易。在这一基础上,他们经营对日本贸易和对东南亚贸易,在环中国海域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明清之际福建海商能够基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⑤

廖大珂指出,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联,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⑥

李庆新还对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指出明代的海外贸易制度已发生变化,有了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某种趋势,即从传统的市舶司贸易向近代的海关贸易转化,其实质是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的“变态”。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可以见证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可以说,它是一条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茶叶

① 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期;《晚清政府对西沙群岛资源的开发及其历史意义》,《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3期。

②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③ 黄秀荣:《16世纪中英海盗群体性格比较研究》(硕士论文,2006年)。

④ 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陈晓望:《论明代福建商人的海洋开拓》,《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⑥ 廖大珂:《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文史哲》2009年第2期。

之路,涵盖了中国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国家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内容。远至秦汉至六朝时期,岭南就与东南亚有了海上交通,到了唐、宋、明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对外交流进一步发达起来。^①

海洋灾害史与环境保护

过去海洋灾害史的研究是海洋学研究或灾害学研究的附庸,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当灾害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界迅速兴起,各类灾害史丛书及著作纷纷面世时,有关海洋灾害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尤其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海洋灾害史及海洋环境研究备受重视。人们开始研究海洋灾害、和谐海洋、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

于运全指出,综观历史学界的海洋灾害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漂风难船的海难研究、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的研究、海洋史学的海洋灾害研究。目前,许多研究领域亟待加强。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还不够系统和完善,海洋灾害的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有待提高,还应加强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②

单修政对灾害研究中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灾害学是最重要的自然社会科学;人文灾害比自然灾害更具毁灭性;研究人文灾害中的公路交通事故、核战争问题、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③

郑冬梅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海洋开发利用影响巨大。目前国内外就此开展的理论研究及案例分析十分薄弱。^④

陈建华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要出发,阐述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意识文明、海洋生态行为文明、海洋生态道德文明、海洋生态制度文明和海洋生态产业文明等主要方面。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重点要提高海洋生态意识,发展海洋生态产业,强化海洋环境保护,推进海洋科技创新。^⑤

简慧兰从加强涉海宣传教育、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和完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等几方面,论述了南通生态海洋建设的具体举措。^⑥

孟德花、刘家沂针对人工岛建设存在的海岛及周边水域环境日益恶化、海岛的传统捕捞业已失去发展空间、海岛生态系统功能丧失等问题,提出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海洋权益、海洋环境、区域布局、公共设施建设等进行综合研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和谐海洋生态秩序,尊重自然规律,考虑海岛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妥善解决人工岛建设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矛盾关系。^⑦

同春芬、杜小丽、张凌娟指出,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渔业生态水域污

①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海上丝绸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 于运全:《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0期。

③ 单修政:《对灾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灾害学》1999年第4期。

④ 郑冬梅:《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厦门的调查与思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1期。

⑤ 陈建华:《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海洋开发与管理》第26卷,2009年第4期。

⑥ 简慧兰:《关于南通生态海洋建设的思考文章分析南通市海洋生态环境现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年第8期。

⑦ 孟德花、刘家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染日益严重,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要树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渔业立法,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①

王森、胡本强等人认为,目前我国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很不乐观,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多种污染和不合理开发造成的,而且还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观念有关。为了加强海洋环境恶化海区的综合治理,应将我国海区划分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5个海域进行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同时,国家应在政策、法律、资金、产业、技术以及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②

石欣则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角度来谈海洋环境保护。他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即强制性争端解决方式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仲裁、特别仲裁以及非强制性解决方式的谈判、调解等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领海权问题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如何开发海洋,特别是可持续地开发海洋已成为世人面临的迫切课题。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和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各海洋国家都在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或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改变了过去领海之外即公海的传统格局,全世界30%多的海洋(约1.094亿平方公里)被划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分别享有不同层次的主权权利、专有权、管辖权和管理权。

1996年5月15日,经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生效。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和我国的主张,中国应拥有宽度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的毗连区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领土的1/3,并在领海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享有完全的主权。此外,我国还有在公海上航行等自由的权利及分享国际海底区域财富的权利。而我国目前面临的海洋形势不容乐观,如: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沙岛屿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大陆架划界争议等,进出大洋的第一岛链已成海上强国合围之势,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海上生命线受控于人,等等。为此加强中国领海权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重要。

孟凡明、许晨光认为,中国发展海权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性,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海洋权益的客观要求。中国发展海权的历史进程将是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盛民族的必由之路。而且中国具备发展海权的必要条件,即地缘环境、国家战略、政府意志、民族特点四个方面兼具。而在如何发展现代海权上,我们应该以开拓的思想去发展中国海权,理性地发展中国海权,建立一个长期的海洋战略;中国发展海权应置于有着广泛法理约束的有序国际环境中,但应清醒认识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力量。^④

① 同春芬、杜小丽、张凌娟:《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黑龙江水产》2008年第5期。

② 王森、胡本强等:《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成因与治理》,《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 石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海洋环境保护》,《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④ 孟凡明、许晨光:《海权思想的沿革与中国发展海权的辩证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6日。

邓碧波、孙爱平探讨了马汉提出的海权论观点。他们指出,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观点,主要内容是:海洋对濒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在海外取得补给基地。这一理论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欧洲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趋势,更为这种争夺提供了理论依据。故他的理论一经发表立即风靡全球,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①

李义虎认为,马汉从海洋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权具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而陆权则很难成为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他的著名观点是,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能成为世界大国。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实例是马汉海权论的重要依据。但是,马汉在论述海权论的同时,也关注陆权的存在与海权的对应关系,其中所揭示的海陆关系是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在这方面,亚洲的实例是马汉论述海陆关系的重要根据。^②

刘中民、修斌、郭培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海权理论与战略、海权与中美关系、日本海洋战略与中日海洋争端、海洋非传统安全、大国南极政策等重大问题。他们证实钓鱼岛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的一些历史地图也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如1785年日本出版了著名学者林子平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一书,以颜色划分区域。^③

王义民、万年庆认为,马汉“海权论”的问世,直接促使了德、日、俄、美等国近代海军的崛起,但却对中国影响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在全球所处地理位置、内部地理环境结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时局影响等多种因素。在21世纪,上述因素及其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中国人更应强化自身的海洋意识。^④

史春林认为,自从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 A. T. 马汉在1890年首次提出“海权”这一概念以后,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目前成为国内外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着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海权发展所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海权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研究海权问题首先要明确海权的概念与内涵。^⑤

刘一健、吕贤臣认为,海权在本质上是一国控制和利用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海权的发展包括一国建立和运用海权的全过程。海权的建立和运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⑥

姜龙范、王新探讨了中日“东海问题”。他们认为,近年来逐渐激化的中日“东海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在能源争夺方面,但它所反映的却是两国之间深层次的政治关系。中日恢复首脑互访之后,政治关系逐渐“回暖”为“东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在双方主张的重叠区域实现共同开发,不仅是中日落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行动,而且也是和平解决“东海问题”的必要开端。^⑦

刘中民认为,从近代到冷战时期,海权问题一直是重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对美国海

① 邓碧波、孙爱平:《马汉海权论的形成及其影响》,《军事历史》2008年第6期。

② 李义虎:《海权论与海陆关系》,《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刘中民、修斌、郭培清:《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王义民、万年庆:《马汉“海权论”对近代中国海军缘何影响甚微》,《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 史春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海权概念与内涵研究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⑥ 刘一健、吕贤臣:《试论海权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⑦ 姜龙范、王新:《中日“东海问题”的实质及展望》,《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洋霸权、维护我国海洋安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冷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具有遏制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并集中体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领域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沉重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①

刘倡萍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海权不是海上霸权,而是有限海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性质是中国海权特殊内涵的根本原因。中国一向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解决海洋争端的原则,这是中国海洋战略特殊性的具体体现。^②

曲波认为,体现了公平原则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第3款的规定对大陆架划界具有指导意义;第83条不是对协商原则的认定,公平原则是大陆架划界的基本原则,其他的原则、方法只有在符合公平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得以适用;单方声明不能对抗条约。东海地理地貌的特殊性决定了中日大陆架划界无论采用协商方式还是司法方式解决,均不能采用中间线划界法。^③

游文丽、张学慧、张晓认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议由来已久。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按照“公平原则”依“自然延伸”标准划界,还是依“等距离”标准按“中间线”方法划界。双方分歧中不容忽视的两个焦点问题就是冲绳海槽的划界效力以及钓鱼岛的归属及其划界效力。^④

周永生、张东江、武伟丽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了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焦点及缘由,深入探究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主张及其在法理上的博弈,进而展开对策性研究。^⑤

另外,由于海权以及海洋战略的极其重要性,这方面的成果较多,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这方面的著作。石家铸的《海权与中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张文木的《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刘中民的《世界海洋政治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鞠海龙的《中国海权战略》(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从海权的理论与实践出发进行研究,尤其着力点在中国的海权及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方面,这样的研究无疑对现实有重要的意义。

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虽然我国在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毕竟海洋史研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新兴学科,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当今世界,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将给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为此,加强海洋问题研究便成为我国当务之急的重要课题。

我们应该大力呼吁加强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综合学界的观点,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问题的研究。

第一,要更新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跳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模式,以海洋活动的海域和海上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国研究。如广州帆船贸易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相当,若对此课题进行深入

① 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

② 刘倡萍:《试论中国海洋战略的特殊性》,《咸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曲波:《对大陆架划界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

④ 游文丽、张学慧、张晓:《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及解决》,《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⑤ 张东江、武伟丽:《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及其解决——从国际法角度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周永生:《日本国内关于东海问题的争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

挖掘,则可以充分展示广州作为南海海域贸易中心的地位。还应该注意科技演变对海洋社会生活的影响,譬如,从帆船到汽船的发展对海洋贸易形态、运河开辟对航线变化、冷藏技术对海洋渔业经济及消费习惯等均有深刻影响。

以海洋经济为主,又不忽视海洋社会人群和组织的探究。对从广东沿海到海南岛、北部湾这一区域的研究应该关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水上人”、“陆上人”这些特殊群体,研究他们经历的复杂的身份转变过程。

第二,充分利用中外官方档案,又重视民间资料、新闻报道等多种信息的发掘,与西方的海洋史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海洋史研究的重要视角。^① 发掘南海的文献资料与南海相关国家的实地调查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结合。如把海洋史研究和广州历史人文资源的研究相结合;广东海洋史研究可以在海洋发展史、海洋文化、人文地理、海洋环境的变迁、沿海社会的变迁诸方面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加强海洋史研究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建立相应的资料数据库,为海洋史的深入研究打好史料基础。比如,积极引进外国档案和文献资料,像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文献,建立资料数据库,这对我们研究 18 世纪中晚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海洋的研究是一个跨文、法、理、工、农、医等几乎所有学科的宏大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学科畛域,推进学术交流,形成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研究海洋史的新局面。要通过加强海洋史的研究,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加深对海洋的认识,培养人们的海洋意识和新的疆域意识。而社会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密结合将有助于海洋问题的研究,使之成为“整体思维”、整体史视野下研究的一个典范。

第四,进一步明确海洋史研究的内涵,即明确海洋史研究的范畴和内容,并清楚地界定海洋史研究中的相关概念。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范畴和内容,笼统地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史。”^②这意味着海洋史研究从大的方面讲应该包括海洋政治史、海洋经济史、海洋文化史、海洋社会史、海洋军事史,等等。但是,这些大的范畴如何界定就需要仔细思考,比如,现有的研究中海洋文化与海洋史之间的内涵与概念的界定就不十分清晰。除此之外,还要构建海洋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完善其理论和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张丽、任灵兰,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审、副编审。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张晓华)

① 杨国桢:《松浦章与中国海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 年第 3 期。

② 冯尔康:《大力开展海洋史研究正当其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6 月 8 日。